

山田一郎

山
田
一
郎

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一些被人忘记掉，一些由时间的河流冲走。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被一些人拼命“忘记”，知道抗日战争中被俘的日本军人建立的先叫觉醒同盟、后叫反战同盟的组织及其成员们的事迹的人，肯定寥寥无几了。反战同盟的故事缺少现场录音录像，但一个内容深刻的故事，又不是几盘录音录像带说得完的。

日本反战同盟士兵，多半活动在战地最前沿。我在冀南先后与单个的和成组的反战同盟士兵打交道，可惜至今能叫出名字的只剩下秋山良照、水原健次两人了。太行山腹地距战地前沿较远，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身为医生的反战同盟成员。他在医院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医生天天给人看病，不可能记住患者谁叫张三李四；相反，病人由于亲身感受很容易记住医生，不论是庸医与名医。

“七·七”六周年前夕，我与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科长刘国平一同到达河南涉县附近北方局太行分局所在地赤岸，也就是129师驻地。刘国平是来汇报工作的，我们分住两处。太行分局组织部接待我的是干部科长刘建勋，中午在农民院子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指给我说，那位正在向

房东借碗箸的是组织部长赖若愚。刘建勋与我年龄相近，善于工作。他约我晚饭后在村外道路上散步，谈谈。赤岸村子较大，居民房舍依地势高下回环，错落分布在面朝东的山坡上。村外一小块罕有的平地，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不像那么干旱缺雨。我的情况刘国平已经大致对他谈过。我希望去延安，当然也准备就在太行学习。他认为两者都可以。不妨休息几天，了解些情况再作决定。我告诉他，上山以来忽然每天咯几口血，连续三四天了，想问问医生。他让我到师部医务室看了看。年轻的医生夫妻俩，说我是肺萎缩。不知究竟，于是决定我先到129师卫生部医院检查身体，再作决定。原来我打算看看太行分局与边区政府从冀南来的熟人和领导同志，现在也只好暂时搁下。我与刘建勋再没有见过面。“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河南省委书记。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在涉县以北清漳河畔山西辽县（左权）麻田镇。涉县上溯清漳河到麻田约70华里。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与129师卫生部、它们的野战医院前此已经合并，地点在更北面30华里的隘峪口村。我从赤岸出发，第二天中午以前到达麻田。饭铺的菜包子刚刚出笼，我一边吃，一边打听出北方局党校就在附近某村。冀南行署副主任刘建章同志正在那里学习，时间充裕，我顺道往访。我与刘见面，他们同室二三人，睡铺上都挂着蚊帐，正准备午间休息。这种很简单、但从容不迫的生活，从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来的人，也感到新鲜。刘后来当过

铁道部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不少人知道的。经党校往北，再经过五年以前到过的桐峪镇，晚饭前抵达隘峪口村。两天来，上下午都咯过几口血，除此没有异样。

休养所所长看过太行分局的介绍信，由护士领我到靠近村边的一间病室住下。三间南房，只有一位病不重的休养员。据他告知，医院共分一、二、三、四所。这里叫一所，医疗水平较好。129师卫生部就住在河滩对面的东隘峪口村。我路上不免疲劳，现在思想放松下来。抱着否定所谓肺萎缩或肺结核、终于去延安的希望，只等安排检查身体。

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上午，突然胸口发热。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一股血流夺口而出。嘴来不及吐，从鼻孔往外喷。大约三五分钟后血量减少，并逐渐停止下来。护士把所长找来，看见地上一滩血，他也估计不出有多少毫升。只嘱咐躺下不要动，让护士用凉毛巾敷胸口，观察情况。大约两小时以后，血又大口往外冲，情形跟上次一样。我用一路上吃饭喝水的搪瓷缸接住血，渐停以后，近少半缸。医生来看，吩咐护士注射葡萄糖液，继续观察。同室病号这时搬走了。下午和往后两天，恶劣情形依旧。我去厕所晕倒，被人抬回病室。中国文献上常说，某人“呕血而亡”，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正面临这种境况。不出现奇迹，就不会延续几天了。显然这也是医生的估计。第四天上午，休养所当过红军、年龄较大的指导员，

站在我面前，关切地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很平静，回答说“没有”。然后又有气无力地说了两句：没有死在战场上，死在医院里，有点遗憾！事后请通知我们机关一下。指导员说，心放宽些。你的病我们还会想办法治。医院里医务主任白云，是日本医生，很有经验。我们已经去请了，他会来的。指导员走后不久，白云主任、医生、护士一同来到病室。情况白云大体已经知道，又问了问。回头对医生说（这位医生我记得姓杜，懂点德文），如果能够找到白阿胶，也许还有点希望。别的没有办法。白云看上去比我要大几岁，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医生想了想，说医院以前好像有白阿胶的，一个多月以前战备藏到山洞里了，不知能否找着。白云没有检查是什么病，就说出了一个药方。事实上，这时不论对病症作出什么诊断，都缓不济急。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药方，控制住呕血，挽救死亡。白云就是说出了一个药方，虽然他也不觉得有把握。这位白云主任，后来知道，他叫山田一郎。

大出血第四或第五天，人已经奄奄一息，眼也快睁不开了。医生拿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白阿胶，对我说，这都归你了。等溶化成流质以后，用羹匙吞服，一天服四五次，看看怎么样。护士拿我的搪瓷缸熬了一满缸，样子像浆糊。我也不管有效无效，头一天就吞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再过两天，“浆糊”消灭光了，说也奇怪，出血居然渐渐减少。四五天以后，吐血完全停止。

西隘峪口村南一二百米有片杨树林，一条清浅的小溪

沟从树林下穿过。轻的伤病号三三两两，常在树林下、溪沟边乘凉聊天。医生、女护士偶尔有来洗衣服或转转的。我不需要卧床了，但严重气短。后来勉强一步步移动，参加到树林人们中间去。他们对我的病看法不一，多半认为白阿胶是不能止住肺结核出血的。究竟是什么病，问题没有解决。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深受病人信任。他给附近农民群众治病，农民称他为“活神仙”。谈天的病友中有人说“你的病只有找钱部长才能确诊。”我问该怎么找法？他们说有办法。你先找唐兮凤唐医生看病，漂亮的唐医生是钱部长的爱人。她解决不了，就会把钱部长给你找来。不久恰逢唐医生来溪沟洗衣服，我跟她谈起看病问题。几天以后，她果然跟钱部长一起到我的病室来了。钱问明了出血情况，仔细听了听胸部，斩钉截铁说，“你的结核病不严重，大出血是人工破裂”。然后说，破裂口不容易短期愈合，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吧。我这才明白过来，何以上山以后忽然咯血？是过敌人封锁线迷路，走到山顶日军碉堡脚下，天已拂晓，连续从悬崖陡坡下跳、翻滚，造成肺部内伤。这就是“人工破裂”了。钱这个诊断后来证明是准确的。它对我同样重要。肺结核虽然没有排除，但不严重，思想负担也就大部解除。看来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工作，心情开始好起来。战场上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当初决心到敌后来的时候，说过准备“马革裹尸”的话，那也不是清谈。我和同一个环境里的其他人一样幸存下来，不过是偶然。与日军遭遇我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碰上山田

一郎、钱信忠两位，使我又活下来。如果说这也是奇迹，那是他们两位丰富的医学经验与治病救人精神创造出的奇迹。去延安的希望陷于渺茫，那就只好等着瞧了。

山田同我后来还有几次简短交谈。他的医术，除了我自己的感受，也耳闻其他病人对他的好评。不久以后，我从西隘峪口转移到附近名叫石暴的小山村疗养。不知道山田是什么时候离开医院的，自然也无从了解他前后的经历。

1963年12月，我参加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团长张友渔因病临时住进东京代代木医院。我们照接待实行委员会的安排，访问日共总部，然后我和侯外庐等去医院探视团长病情。时间仓促，也不可能想到医院有何可以留意的地方。不久，中国举办国际“北京科学讨论会”，我是中国代表团团员，钱信忠是副团长之一。在一次交谈中，我问钱，山田一郎其人不知下落怎么样？钱答：他现在叫佐藤，是日共代代木医院院长。那时距离在隘峪口与山田相遇，不过20年，见面或者还能认识。我去了代代木医院，毫无所知，真是失之交臂。十年内乱过去，我几次访问日本。日共与中共这时断绝来往，我也不便去打听山田近况，只是在碰到有人问我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时回答说：我在日本不止有学术界的朋友，也有战场上的朋友。这首先说的是日久没有忘怀的山田一郎，也是指在冀南战场上一起活动的反战同盟的朋友。

俗谚说：山不转路转。这个话好像谈不上什么哲理，

但它指出世界上的事是不断变化的，你没有想到过的情景是可以突然出现的。转来转去，我终于又一次与山田见面并知道了他的生平梗概。从中可以窥见，他是反战同盟那个群体一位出色的代表性人物。

山田一郎“七·七”事变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就业以后潜心研究医学。1938年5月被征入伍，编入华北派遣军，驻扎山东兖州、汶上县等地。1939年8月随部队“讨伐”梁山一带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包围，恶战一昼夜，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人全军覆没。他头部负伤，与另外四名日军一同被俘。过了两个月，他在微山湖小岛逃跑，几天以后再次被俘。开始在太行山八路军野战医院当医生，他打听附近铁路，寻找武器，继续准备逃跑。思想转变以后，他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6月，也就是在隘峪口医院给我看病以前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44年到延安进入冈野进（野坂参三）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中共七大会议他参加旁听。“八·一五”日本投降，他这时是马上就要回国的冈野进的三名助手之一。在参加毛泽东特地为冈野进举行的欢送会之后，他们一行四人，从延安乘飞机至东北，转往莫斯科，1946年1日，经朝鲜回到日本。他从此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日本共产党，创办日共领导的东京代代木医院，担任院长、总院长达50年。

山田的经历、活动中，有两点很鲜明：

他从一名饱受军国主义教育，只知道“为日本而战”

的军医，转变为信仰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当然是由于被八路军俘虏，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但他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对于一向排斥、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学说轻易地盲从。在他思想上对于那个学说有一个接受与不接受的问题。他在高中时代曾见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画和传单，从来没有想过去接近它。在八路军里生活两三年以后，体会到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正义性与坚定不移的信心，开始了“新生”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他从反战同盟朋友那里读到苏联哲学家米歇尔·比索卢比奇著、广岛定吉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他说书上“最初让我叹服的是对于‘物质、空间、时间’等概念的严谨的理论叙述。就这样，每天晚上我读这本书直到把油灯里的油用干”。那本书放在他背囊里，打仗行军，变得破破烂烂的。他先后还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苏共党史、小林多喜二的小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那些读物使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与日俱增。他说那时自己在日军包围下，不知经过多少次九死一生的险情，“但我的思想完全不曾动摇过”。事实证明的确是这。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再次大“扫荡”，反复搜山。他与卫生部工作人员隐蔽在山洞里，沉稳应付从洞口来回经过的其势汹汹的敌人，一同渡过危险。当时在场的老干部，至今犹能言之历历。一要在实际工作上锻炼，二要接受新的思想理论启迪，山田的转变就是这样实现的。

山田一太郎

在这方面，他体现了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不过环境对他更加困难。

山田回到国内以后，一直站在进步群众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前列。办医院的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战争中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军人回国以后，组织起“八四友会”（取八路军新四军各一个字命名），追求和平民主，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日本投降50周年，“八四友会”出版“战争体验”专刊，它叙述成员们的主张和目标说：我们中的很多人以前被欺骗，为日本军部侵略中国所利用。自从作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我们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本质。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我们在中国的战场上，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反战活动。“战后，日本与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期间的日本历届政府，一贯不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是跟在美国后面企图推进军国主义的复活，扩大向海外派兵。我们一定要阻止日本再次踏上悲惨的战争之路”。“八四友会”的成员们反对当局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这与日本众多抱有利知的国民、占主流地位的历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侵略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来自血与火交融的战场上，来自对中国人民家破国亡、灾难痛苦的亲见亲闻，这使他们又是具有独特的条件来认识侵略战争的。山田是“八四友会”活动的组织者、推动者之一。1983年、1997年，他先后发表文章，指名批评中曾

根。他说自己在青年时期，认同了“为日本而战”的欺骗民众的帝国主义思想，那种思想和独裁制度非常可怕。“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战的口号”，反动活动猖獗，应该与这种反动活动斗争到底。他去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叫《一个幸运的人——军医、八路军俘虏、新的战士》。他们是那个群体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的代言人。他们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行动是勇敢的，是正义和光明磊落的。众多普通日本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反映。

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军，据1945年3月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部门公布，共3880人，逃跑220人。先后参加觉醒同盟—反战同盟的1200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最多时百余人。他们都是反战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日本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日军，最后大部分集中在贵州镇远县战俘营，共500人。另一西北战俘营，人数不详。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在郭沫若等支持下，一度在重庆建立日本反战同盟总部，少数士兵并到宜昌前线进行反战活动。国民党担心他们受共产党影响，命令解散反战同盟，那些战俘此后默默无闻。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对立，也连及到日本战俘现实的与后来的遭遇。“八·一五”以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周恩来欢送他们说，各位回国，我们没有赠送什么珍贵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青年”。山田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分子。他和

他的同志，是日本法西斯给自己播种下的否定自己的充满活力的种子。

我与山田，即现在的佐藤猛夫先生又一次见面，是1998年11月在东京。经过事先联系，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尾行洋一陪同，一行四人，至东京目黑区佐藤住宅造访。主人在门口迎接，当初两个青年人，现在是一双龙钟老叟。当然谁也无法辨认面前是谁。坐下寒暄，追述往事，当我提到“白云医务主任”时，他不顾费力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拉住我的手，说：“白云”那个名字只在短时间里用过，知道的人甚少，我们在隘峪医院相识，这是确凿无疑了，感谢，感谢。在场的女主人、和我一同造访的朋友都为之动容。时间相隔55年，世界变化天翻地复。一名来自八路军的病人，一名八路军医院里给病人留下难忘印象的日本医生，重新碰到一起，回顾往事，我们都没有忘记过去，没有淡化当初的理想。我们的会见，友谊、庆幸、乐观、慨叹衰老，兼而有之。这尽管只是个人的交往，它的背景是反映的抗日战争复杂的状况，以及由抗日战争演变而来的生活现实的一角。

与佐藤见面的当天，尾行教授在一个会上宣布说，今天上午刘大年先生与老朋友日本的白求恩佐藤先生见面，情景感人。我是从个人角度了解佐藤的，是否可以称他作“日本的白求恩”，没有想过。全面评价山田在八路军医院里的工作，我想要以当时的领导人钱信忠部长的看法为准。回到北京以后，我去看望好几年不见的钱老。他87

岁了，健康一如昔时。我讲了会见山田的情况，留下会见的两张照片。钱老讲述在太行山医院里的情形说：那时医院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某某，很好，但年轻，是来实习的。山田则很有经验。在医院里，外科手术我自己做，内科由他主治，他肯负责任。至于称他是“日本的白求恩”，我看“可以这样说”。60年代他担任国家卫生部长时，邀请佐藤来中国访问过。总之，钱对佐藤的评价是很好的，是友好和怀念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中有不少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我这里叙述的，显然也不失为那种话题之一。

钱的记忆力惊人。在我们谈话快结束时，我说，当初与日军遭遇，肺部破裂不死，对您和山田我是永远感谢的。他不假思索说，你是外伤出血，一看就可以知道。肺结核出血不是那样，除非有空洞。不过当时是危险的，你是命大。“你是命大”这句话他以前对我也是说过的。

佐藤虽然年近九旬，1998年底我两次接到他的来信，说想见见钱部长和我，并到太行山看看。当年用武之地的太行山，至今犹在他的向往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的《一个幸运的人》回忆上，我所知道的事迹是实实在在的。太行山医院里，工作人员以为他是光棍，曾经酝酿给他介绍一位女护士，但事情没有成功。在东京，我们谈话中，我插进了这个情节，并向他夫人表示抱歉。他只是说，“我不是光棍”。等我看见回忆录，上面详细记载

着那段故事，而我所知的不过是休养员中的传闻，只是说明那并非子虚乌有。回忆录所附的各种照片中，竟然有两张难得的隘峪口的照片。50多年前八路军野战医院人物衣饰、环境外貌跃然在目。跟它近在咫尺的，就是西隘峪口村城堡式的拱门、我呕血住的病室、休养员们乘凉聊天的杨树林、女护士们洗衣的流水溪沟了。我仿佛又一次置身其境。